

经济学中的主流与非主流： 历史考察与中国情境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崔学锋（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对立是历史的产物，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上升和职业经济学家共同体的建立而出现的。在任何情况下，非主流经济学的存在都是非常必要的，多元主义是避免理论僵化的前提条件。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展开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中国经济学界目前出现了三种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我们必须反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趋势，但没有必要强调其他范式要占主流地位。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问题导向而不是范式导向的，这是由社会实在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义科学精神所要求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对抗；对话；中国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06)02-0034-05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非主流”运动的旋风。它从最初的被漠视演变到今日的针锋相对，这是令人吃惊的。因为真正意义上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它传播到中国并得到大众的认可，只不过是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实现的。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的版图似乎已经发生了变更。然而，何谓“主流”，何谓“非主流”，在不同的语境和历史条件下，答案并不相同。

一、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对立是历史的产物

一般而言，主流经济学是指一定时期和地理范围内，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说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某种理论或学说。其主导地位或者表现为它在经济学术界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和赞同，或者是作为官方做出经济决策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相应地，非主流经济学则是处于相反地位的经济学说。

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从历史上看，不同经济学家对同一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并不奇怪。然而，严格

意义上的“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对立并不是由来已久的，而只是历史的产物。19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界并不存在主流与非主流的对抗，原因一是市场经济并不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主体部分，二是职业经济学家的队伍和科学研究共同体尚未建立起来。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研究大多是私人的独立行为，是作为学者的兴趣而存在的，不同学者对同一经济问题存在分歧和争论是正常的，更是属于平等的研究主体之间平等对话，根本谈不上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交锋。例如，虽然亚当·斯密被供奉为经济学之父，但在斯密的时代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与之相竞争的学说，比如在《国富论》中被斯密加以批判的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等等，但是我们能说斯密的经济学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吗？按照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通常看法，斯密之后，李嘉图成为执英国经济学之牛耳者，但同时时代的另一位经济学巨人马尔萨斯并不同意李嘉图的大部分经济理论，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是，我们能说李嘉图经济学是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主流经济学吗？恐怕斯密和李嘉图

收稿日期：2005-05-14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男，河北蠡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经济学思想史研究。

本人也不会以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自居吧?

19世纪末, 经济学开始在社会科学中获得显赫地位。由于工业革命在欧洲和美国的陆续完成, 经济生活上升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 对于小至企业和家庭的日常经营, 大至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重要性空前提高。相应地, 作为一门正式的学术建制, 职业经济学家的研究团体才开始在欧美主要的国家建立起来, 它们包括德国的社会政策协会(1872年)、美国经济学会(1885年)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1890年)。与此对应的是为科学研究成果提供发表途径的专门的经济学杂志的创办, 它们包括《美国经济评论》(美国)、《经济学杂志》(英国)、《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德国)等。

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的“皇后”和职业经济学家的出现, 对于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 由此也带来了一些先前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即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尖锐对抗。出于对当事人的学术权力和切身经济利益的追求, 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成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党同伐异”、清除异己的活动。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让位于不同程度的学术垄断, 不同理论观点之间正常而必要的平等对话让位于权力和利益的对立。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研究的控制和支配主要表现在对经济学论文在主要经济学杂志上的发表、教授职称的评定、科研经费的争取和评奖、经济学会议的门槛设定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等方面。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不容异己, 以前令人尊敬的知识领袖嬗变为“学霸”。这首先在著名的德奥“方法论之争”中得到生动的体现。当门格尔毕恭毕敬地将《国民经济学原理》作为“一个奥地利同道者发出的友谊的敬礼”献给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罗雪尔时, 得到的是漠视和不屑一顾, 这激起了他方法论一书的诞生。施莫勒对待这本书的态度是令人震惊的轻蔑和人格侮辱, 门格尔立即还以颜色, 被后人称为“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的方法论大战由此展开。作为论战结果之一的是, 所有奥地利经济学的信奉者都被彻底地赶出了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这场方法论大战可能是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第一次大规模的正面交锋, 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坦诚、严肃而又不失激烈的科学探讨相比较, 我们不禁为德奥双方的尖锐言辞和人身攻击而悲叹。但

是它的历史教训并没有被今天的经济学界所吸取。已有的文献表明,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在美欧经济学界(尤其是在美国), 上升到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异端经济学大肆围剿, 新古典霸权已经迫使许多富有原创意识的经济学家不得不要么接受前者对什么是经济学以及如何研究经济学的界定, 要么转投他行, 比如转向在管理学院、社会学系以及科技政策研究所等机构谋职, 经济学的学术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今天的美国主流经济学界不仅缺乏重大创新, 而且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 经济学家被炒鱿鱼已不再是什么新闻, 经济学注册学生的数量也开始锐减。热闹的学术研讨会已经提不出新东西, 充其量只是一种“虚假繁荣”。大规模的反抗已经开始,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使欧美经济学界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这是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独家垄断、排斥异己、固步自封造成的恶果, 我国的经济学界应引以为戒。

二、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应该展开更多的对话而不是对抗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兴起的“非主流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按照杨帆先生的看法, 国内的主流经济学是指学术层面上的新自由主义, 它是以“新古典主义”和“(新古典)制度学派”经济学理论包装起来的西方意识形态; 提出“非主流经济学”就是为了打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垄断。但是, 新自由主义只是杨帆先生所说的国内“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征, 从科学基础上来看, 它还具有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等特征; 总的来说, 它基本上是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翻版。20世纪90年代是这种“主流经济学”在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时期,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经济政策制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教育体制对我国的经济学教育也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但是,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弊病, 如公平的缺失、腐败、民族工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附以及国家的经济安全等, 一些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抨击, 这就是杨帆先生所说的中国“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起。这些经济学家虽然人数较少, 但由于他们关注民生, 敢于直接揭露和正视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最敏感的话题, 因而能够赢得人心,

在短短的几年内获得了众多普通公众的认可和支
持。在推动学术界的批判性反思和政策转型上,可
以说他们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我们认为,杨帆先生
所说的中国当前的“非主流经济学”具有两大特点:
首先,它主要是“中国问题的经济学”,不是理论导
向而是问题导向的。其次,它并没有共同的思维范
式,自认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人在许多问题上都相
互有分歧,这无疑将影响这种“非主流经济学”在国
内的进一步成长。

然而,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并不承认西方新古典
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所谓“主流”地位,尽管我们认
为这种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取
得了“主流”的地位,但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学界仍
存在着多元化发展的机会。进入21世纪特别是最近
三、四年以来,反对中国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
“接轨”的声音虽然微弱,但不断在增强。我国的一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对经济学界把他们看作是处
于“异端”或“非主流”的地位,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在我国的主流地位。这种强调是可以理解的,虽
然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不可能像它在美国那样在我国
经济学界形成统治地位,但它在我国的发展势头使
许多人不得不产生存在这种危险的担心。

但是,无论将来哪种经济学能够成为中国经济
学的主流,我们都认为,在思想领域中,正如在生物
界一样,多样性是演化的动力,在任何情况下,非主
流经济学的存在都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该以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为指导,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核
心,既要反对西方经济学教条,也要反对僵化地对
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本着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精
神,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因此,为了抵消
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中国所谓“主流”地位的
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国内的“非主流经济
学家”都有必要从批判性借鉴的角度关注西方异端
经济学的新发展,而国内“主流”与“非主流”经济
学家也应该展开更多的对话以达到相互了解和理
解,而不是互不理睬或相互对抗。这是因为:

第一,这有助于国内经济学界开阔视野,在广
泛比较和批判性思考中实现对国外经济学的引进
和吸收,避免从一开始就误入某种劣等路径难以自
拔。对中国人而言,经济学是舶来品。在如何对待
国外经济学说的引进和传播上,经济学本身的历史
对我们会有裨益。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任何经济

学说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不同的国家
和不同的时代,产生过不同类型的经济学,而这些
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或多或少地居于主
流地位,比如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20世纪40年
代,历史学派在德国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它对于指
导德国的崛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英国,约
翰·穆勒1848年的著作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直
是当时流行的教科书,马歇尔经济学在1890年到
20世纪30年代是英国的主流经济学,在此之后,凯
恩斯经济学成为主流直到70年代撒切尔夫人执
政;在美国,1900年到1930年,由凡勃伦开创的制
度主义经济学居于主流地位,二战结束后,新古典
综合派经济学处于主流地位,80年代后,理性预期、
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地位开始上升,但新古典经
济学或新古典精神依然是支配美国当代经济学
的基础。如果把视野扩大到美欧以外,在前社会主
义的苏东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苏式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一直是标准的经济学模板。在今天的
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呈现分庭
抗礼之态势。经济学本身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多
姿多彩的画卷: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
古典经济学,它们都不是经济学的全部。反观我国
经济学界,我们对国外经济学的引进和介绍从来就
是在缺乏宽广的视野和必需的批判性反思的前提
下,就先入为主地在国内传播:先前对传统的政治
经济学是如此,如今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先
前只关注苏联,现在则只聚焦美国。历史的教训
值得吸取。今天,在国外经济学界面临重大转向
的关头,中国在经济学的学习和引进上,更应当放
宽考察的视野,而不应该把目光只限于某一国的
某一种经济学上,更不能食洋不化而没有批判精
神。

第二,更多的引进和对话能促进创新并产生
原创性的“中国经济学”。新思想总是以异端的形
式出现,非主流经济学中常常蕴含着创新的萌芽。
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今天的
主流经济学本身在其诞生阶段也是作为异端学说
而出现的,今天的非主流经济学有些曾经是作为
主流经济学存在过的,有些甚至有望成为新的主
流范式。在任何时刻,容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声
音都是非常必要的。主流经济学不应非主流进行
打压和排挤,不同经济学说之间应该展开更多
的对话,而不是对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真理越辩越明”,在学

术层面上不能实行“不争论”原则。我们应当在经济学界倡导并努力促成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多元主义和争论尤其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经济学是时代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完全移植和照抄国外的经济学,或者像有论者认为那样“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那么中国经济学界就无法在世界经济学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与经济发展相类似,在经济学研究上也有后发优势问题。“中国经济学”的独特发展路径势必要在对国外不同经济学说的引进中,在不同学说的交锋中,在对中国发展经验和已有的文化土壤的结合中得以实现。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文明复兴,理应而且能够在理论经济学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其经济学起步阶段出现多种不同理论形态,这不是坏事,而是机遇。

第三,平等对话和交流也是学术民主的要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既是科学,也是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前,传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别充当了强化和巩固两大阵营敌对状态的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就历史性地成为主导性经济学形态,当时的样板就是苏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相比而言,我们对作为纯粹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研究非常薄弱。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从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把鼓吹“看不见的手”、私有产权、政府不干预经济等信条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其向前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内容,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性及其缺陷却长期以来得不到讨论。苏东剧变后,大量解密的文献表明,英美等国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宣传上,考虑国际政治斗争的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国内,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内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前国内的“非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产权神话、市场神话等教条的批判中产生的。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以问题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

粗略地看,在当前中国理论经济学领域,至少已经出现了三种经济学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以演化经济学为代表的对

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吸收和创新。对中国经济学界而言,这是一桩幸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有深厚的研究基础,而且也是官方的主流话语;“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起无疑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视与研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面临着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如何使之不再陷入对经典文献的注解和诠释从而陷入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境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任重而道远。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减缓中国经济学的新古典主流化步伐和促进国内经济学的多元化和争鸣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将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或西方异端经济学家都赞成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作为其科学哲学基础,而马克思则是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当之无愧的先驱,这就有可能把演化经济学或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许多成果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使之得到丰富和发展。

虽然人们对它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有加速传播和主流化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一批学数学出身的青年留美经济学者纷纷回国任教,国内的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进一步加强。可能是出于无知,不少人开始接受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界定,深奥的数学证明似乎代表了科学真理,流利的美国英语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至于这门学科的历史是怎样的,经济学与现实的相关性,经济学是否以及有无可能存在可供替代的理论范式,他们是不予考虑的。这种情况可能也事出有因。高校扩招后,大批的学子涌入经济学课堂,广义上的经济学学生占全部在校生的比重高达四分之一,学生来了总得学点新东西,传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陈旧,当然不是首选,而除了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之外尚没有其他可与之匹敌的相对完整的教材体系,况且经过商业宣传,萨缪尔森、曼昆等人的教科书被奉为神物,再加上人们对美国的盲目崇拜,在“美国的东西必定是最好的”这样一种潜意识下,美国的、新古典的、数学化的经济学逐渐在国内泛滥。对这种范式的不假思索的接受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进步和健康成长的最大敌人。

第三种经济学范式,即对演化经济学等“异端

经济学”的综合和再创造。这种经济学在国内起步更晚,任务更艰巨,非兼具中西之才和开阔的胸襟者莫能完成。国际上的“异端经济学”诸流派不仅在研究纲领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而且门户之见盛行,虽说在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面他们已经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联盟,但这种结盟也只是策略上的考虑,在不少基本问题上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歧见。当然,对“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是个长期的工作,不能奢望在短期内出成果。但至少作为初步工作,大力引进国际上出现的异端经济学,将它们的部分思想介绍到国内来,这对中国经济学界开阔视野,在促成国内经济学研究多元化格局上,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在这里,除了我们上面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批判性地吸收演化经济学或西方“异端经济学”许多成果外,我们这里还要指出,演化经济学还可以通过对西方异端经济学的综合作为第三种经济学在我国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当然它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或批判实在论为指导,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

最后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把握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范式导向还是问题导向?我们认为,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因为社会实在的开放性、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演化性决定了人类对“实在”的理解必然是有限的。面对人类复杂的现实经济活动,知识特别是某种单一的范式总是一种不完全的知识。因此,以中国问题导向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总体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必要强调上述三种经济学范式中的哪一种

要占主流,但必须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为指导,强调经济科学要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在多元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使中国经济学得到繁荣和发展。所以,无论何时,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在地位如此显赫的经济学界,非主流经济学的存在都是非常必要的。倘若有一天在中国经济学界听不到不同的声音,那绝不是福音,而是经济学的灾难。

参考文献:

- [1] 杨帆. 非主流经济流派掘动主流经济学帝国根基——访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 [EB/OL]. <http://www.wyxwyzx.com/xuezhe/yangfan/>.
- [2] 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三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3] 贾根良.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J]. 南开经济研究,2003(2).
- [4] 杨帆. 关于经济学“非主流”的对话[J]. 开放导报,2004,(1).
- [5] 左大培. 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N]. 中国经济时报,2002-08-31.
- [6] 贾根良. 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N]. 光明日报,2004-11-30.
- [7] 爱德华·富布鲁克. 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最初600天[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8] 贾根良. 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J]. 社会科学战线,2005(3).
- [9] 贾根良,崔学锋. 当前西方经济学界主流与异端的分裂及其发展趋势[J]. 当代经济研究,2005(6).

(责任编辑:许桃芳)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hinese Context

JIA Gen-liang, CUI Xue-f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is a product of history, and it appeared onl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ith the increasing position of economic lif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economists' community. The existence of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is necessary in any case. Pluralism is the premise of preventing theoretical ossification.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economists should develop more dialogues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will depend on trade-off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three kinds of economics: Marxist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Key words mainstream economics ;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 confrontation ; dialogue ; Chinese economics